

第一章 构想、转换、偏离与回归

——科学社会主义演变轨迹与民主主题之凸显

社会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列宁完成了转换,使得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产生,为此,他力图弥补这两大基础;此后的斯大林、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偏离,也就是偏离了这两个基础;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认识基础上回归到马、恩,也回归到列宁,也就是要重新弥补这两个基础。今天生产力基础弥补得比较好,民主发展还需进一步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构想、转换、偏离与回归的历史轨迹,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产生的两大基础,即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展开的,其中清楚地预示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必须推进民主建设的当前使命。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这一构想有科学的依据,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即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只有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极其丰富,才能够实现按需分配,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分配的公正,进一步实现社会和谐。而资本主义发展正是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这两大基础。这一科学构想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科学认识基础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规律,科学地揭示了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内在逻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在提出生产方式矛盾规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②;“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③。与此同时,他们揭示了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强调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节。“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④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经济和政治作为带动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人类社会逻辑演进的总趋势,也是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历史命运。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呢?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同时又充分估计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如果说经济和政治是带动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那么社会主义产生的必备前提和基础有二:一是生产力基础,二是民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作自然历史的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0页。

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只有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财富极其丰富,才能实现按需分配;而当生产力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大家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民主保证公正又是必备的,否则,有的人要什么有什么,有的人要什么要不到什么。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明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新的社会要“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全体社会成员参加下来经营”^③,也就是说彻底地、真正地实现人类民主。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民主,也正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过程,也是为自身掘坟墓的过程。资本主义以其商品经济的方式极大地发展了以现代工业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产生的生产力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同时强调,“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⑤。资本主义以实现政治解放的形式创建了现代性民主政体,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产生的民主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是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⑥,“任何政治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⑦同时指出,政治解放为社会解放创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4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了前提,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治的最后形式,“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①。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②,至于直接还是间接,也就是说新型民主的发展程度,要视其本来的民主程度而定。

在这个意义之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正是具备了社会主义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正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产生越早。

二、列宁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换

在列宁的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转换。经过这一转换,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基础——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不复存在了,这是转换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所必须面对的。

那么,首先,列宁为什么能够提前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这一转换?事实上,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并非凭空产生,它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灵活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他们强调:“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与马、恩时期不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阶。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因此,“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特别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又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而且能够在落后国家中取得胜利。当时的俄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列宁抓住了机遇,把俄国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因而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在落后国家成为现实。

其次,列宁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换后,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以及列宁实现转换后的实际,很清楚,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基础是不能跨越的。列宁及其领导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重新弥补生产力和民主这两个基础。

应该说,列宁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了俄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基础的不足,他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②“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③,他准确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脱胎于东方封建宗法的小农社会。列宁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还没有烧好。”^④俄国“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⑤。正是因此,列宁很清楚地认识到,转换实现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果,弥补好生产力和民主这两个基础。

纵观列宁晚年的实践,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晚年努力在做两件事:一是新经济政策;二是新政治政策。而这两大政策正是在力图弥补社会主义应有的两大基础。

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要求实行商品交换,恢复商品流通,改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7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⑤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造国有企业,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力图通过商品(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建立“电气化”生产力基础。依据当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背景,列宁认为电气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他因此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①的著名论断。而实现电气化,就要利用商品经济解放生产力。列宁指出,“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②,“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关、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差距更远”^③。正是因此,列宁把商品交换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从而把市场机制在俄国固定下来。

除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力图弥补生产力基础,列宁晚年几乎全部精力都在思考政治民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治政策。他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④他在晚年特别是病重期间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思考,集中体现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他把民主化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主旨,把官僚主义作为主要敌人,要求民主化改革从执政党自身做起,强化人民监督权,改造国家机构,设立工农群众制约监督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农检查委员会,设立由专家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给以立法职能,与苏维埃决策机关相制衡等等。这一切表明列宁晚年力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基础。

可惜的是,列宁很快就去世了,他未能完成转换之后对社会主义两大基础的弥补工作,需要之后的继任者继续完成。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三、斯大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偏离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但在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出现了偏离。而这一偏离,说到底就是偏离了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

斯大林把列宁“一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①。应该指出,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有其合理性,增强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超越了列宁正确分析过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超越了弥补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的阶段。斯大林偏离了这一方向,过早地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成为苏联模式的理论前提。以此为指导,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运行模式。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但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同样出现了失误。毛泽东没有很好地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并一次又一次地缩短了赶超时间。随后又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在个别行业、个别省份可以尝试着首先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取得一些办法和经验。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实践严重超越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正如邓小平总结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

^①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论述》,载于《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② 罗平汉:《“大跃进”的发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①最后导致穷就是光荣,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的结局。邓小平还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②

与此同时,斯大林、毛泽东都忽略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高度民主,没有考虑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加上历史、国情和个人因素,两位领导人在党内生活中片面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片面强调“专政”,忽视“民主”,这就容易使得民主建设不健全、不完善。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很容易造成领导人意志强加于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以政治挂帅大搞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可以说,斯大林、毛泽东都忽视了列宁已经完成了历史转换这一特殊背景,不知道在列宁转换后需要弥补社会主义的两个基础,而是直接把马克思、恩格斯未来高级的社会主义理论照搬到落后的实际当中来建设,这就跨越了阶段,脱离了实际,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四、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本质重新认识中实现回归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高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及其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此,社会主义开始了回归之路。

回归到哪里?就是回归到马、恩,也回归到列宁,就是回归到弥补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的方向上来。邓小平清晰地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①因此可以得出,邓小平的回归就是回归到马恩,回归到列宁,即回归到马恩对社会主义基础的要求,回归到列宁对于落后国家弥补社会主义基础的思路。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计划。”^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也就是弥补社会主义两大基础的过程。事实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阐述的实质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主保证公正的实现。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③他充分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发展生产力更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④。“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得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⑤,等等。当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方式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办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①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科学地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思路。

邓小平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②这一重要论断,特别强调“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恢复了正常的民主秩序。特别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思路。十三大报告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治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④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邓小平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弥补了生产力这个基础。我们完全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基础弥补得比较好了,生产力发展问题上也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但是,由于时间的局限,民主建设虽已做了很多探索,但还没有充分展开。

五、推进民主建设:当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主题

既然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强大的生产力来保证社会主义实现的物质基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④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础,又要有民主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正与社会和谐;既然社会主义发展的轨迹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生产力发展和民主建设这两大基础上来什么时候就成功,那么,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使命和主题就已经很清楚,就是要在继续弥补好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通过民主建设,包括依法治国,来保证社会公正与和谐。这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170多年构想、转换、偏离到回归的发展轨迹所告诉我们的。

第二章 什么民主？怎么民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新课题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我们清楚地看到，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个民主绝不能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还必须要有一定的集中。因此，“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建设民主？”恐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又一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的历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时代课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不断深入。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全面深化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继续深入研究并揭示当今中国的新的时代课题。揭示了当今新的时代课题，也就弄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前使命。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规律，我们认为，当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建设民主？”越来越迫切和必要，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新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规律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笔者觉得这种概括恐怕还不够。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确实是通过这两个结合推进的，但结合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在

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并解决当时的时代课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探索和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并进一步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历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演进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因而,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之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而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找到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必须首先破解的第一个时代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曾经有过两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规律的理论,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和西方一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通过“二次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二是照搬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希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而毛泽东则早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这实际上否定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明确肯定了必须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从思想根源上对党内历次“左”、右错误的实质进行分析,从哲学高度解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正是在精彩地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坚定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课题,就是要在继续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集中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义”，进而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也有两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照搬马、恩关于在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设想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照搬中国革命时期的经验，用“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建设，结果导致了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抓住了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①，并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②这条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⑤这就进一步弄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且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⑥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时代课题，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下，从人民的发展愿望与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功能、本质、目标和任务，从而最终破解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纪性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新阶段新形势把我们党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那就是：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后，我们党已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时代课题，就是要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和执政党的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长期稳固，也即要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总体思路下，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党的执政历史方位、性质、宗旨、根本任务和执政合法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把党建设成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核心等基本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脚步在加快，理论创新的脚步也在加快。新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解答。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时代课题就是要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也即要清楚地回答如何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思考这一时代课题，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的创新理论。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几年来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战略思维，力求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转型，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理

念、发展思路、发展主体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勾画出了适合当代世界客观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第一次全面而科学地解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正是不断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的历程,在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新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清楚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并进行理论创新的历程。那么,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深入研究现实,弄清楚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新的时代课题是什么。而要弄清楚当今中国的时代课题,必须首先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本质属性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症结两个方面,分析当前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

首先,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本质属性看。

生产力基础和民主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合理形态不仅有其生产力基础,更有其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的核心便是民主。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最终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也要靠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消除社会主义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充分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和成熟，才能使它的政治制度相应地发展和成熟起来；只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才能消灭贫困，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高度的民主本应是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之义。恩格斯 1845 年就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他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①，完全肯定了民主与共产主义存在直接对应关系。在当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往往被视为同义语，因此说“民主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民主就是社会主义”，从而把民主看作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列宁进一步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②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③经典作家把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民主真正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目标；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社会，要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都必须以充分的人民民主做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我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积习和影响深厚的国家来说，更是十分重要和有待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两大基础上，生产力发展已经到一定阶段，我们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民主建设上，以保证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以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来看。

改革开放近 40 年中，我们不断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新时期，我们正面临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社会改革的目标便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社会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实质和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6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8 页。